

论泰国政局动荡的原因 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 从1932年开始,泰国就开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然而,经过70多年民主化发展的泰国政治仍未走出“政变(军政府)一选举一文人政府一危机一政变(军政府)”困境,军人干政、政客弄权、群氓政治、金钱政治等政治乱相仍频频上演、层出不穷。造成泰国政局动荡不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地区发展失衡、阶层过度分化;二是政治制度不健全;三是法治不完善;四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分析总结泰国政局动荡的原因,可以为当前中国如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许多重要启示: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及时解决地区发展失衡、阶层过度分化问题,以缓和地区分化和阶层分化矛盾;其次必须坚决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建设法治社会;再次必须深化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规范完善利益表达渠道;最后必须肃清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影响,切实加强公民教育,培养成熟公民政治文化。

[关键词] 泰国 政局动荡 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 D733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1369(2010) 5- 0125- 13

泰国自从1932年民主党发动政变、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就开始走上民主化发展的道路,然而其过程相当艰难。70多年来,泰国颁布的宪法之多、经历的政变之频繁、组织的内阁之短命在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无出其右者。可以说,经过70多年建设的泰国民主政治尚未走出“政变(军政府)一选举一文人

收稿日期: 2010 8. 15

基金项目: 本文属“东盟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研究”(批准号为06BZZ2003)子课题。

作者简介: 肖立国,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斌,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541004。

政府—危机—政变(军政府)”困境。2006年9月19日,陆军总司令颂提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散他信领导的看守内阁。在这之后的短短三年之间,泰国产生了四位总理。与此同时,民盟支持者和反独联支持者轮番走上街头,多次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2009年4月,反独联示威者在帕塔亚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迫使泰国政府宣布取消东盟系列峰会,更是让与会者震惊,让世界舆论哗然。进入2010年以后,泰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似就泰国政局动荡的表现、原因和启示,作初步的探讨。

泰国政局动荡的主要表现

1. 军人干政

泰国历来有军人干政的传统,泰国的政府更迭及军事政变的频率在东南亚各国历史上是最高的。“泰国军队从未接受西方‘文官至上’的军人价值观,相反认为军队是政治的参与者。”¹可以说,当军人认为有机会、有必要政变时,政变就会发生。自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政治就一直处于军政权和文人政府交替统治之中,其军队动辄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废除宪法,干预国家政治。从1932年到1997年的川·立派政府,泰国65年经历的56届政府和22位总理中,文人政府为27届,13人担任总理,但执政时间总共只有16年,而军人(或军人背景,如差猜、差瓦立)政府为29届,9人任总理,执政时间却长达49年。²2006年9月19日,颂提将军再次进行军人干政。虽然这次政变受到大多数民众认可,泰国媒体也认为政变是解决当时政治困局的唯一方法,但军事政变对泰国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依然不容小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军队发动政变更多地是为了争权夺利,并越来越成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祸害。而经常性的政治中断无疑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危害。就拿最近一次政变来说,经过15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机构,比如国会、法庭和宪法,刚刚有点根基,就轻易

¹ 张锡镇. 当代东南亚政治.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294

² 任一雄. 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 泰国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1

地被军人的坦克和部队摧毁。另一方面,民主的成熟需要公民不断的见习,经常性的军事政变只会排斥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无法学会如何有效地解决政治危机、控制政权,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迟迟无法建立,民主政治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得不到发挥,进而很可能否定民主的价值。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军事政变对其打击尤其严重,很可能对原有的民主政治制度推倒重来,使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太多不必要的曲折,并有可能陷入军人干政的路径依赖。

2. 政客弄权

在泰国政治中,政治强人的色彩非常浓厚,重要的政治资源尤其是选票往往掌握在政客手中。政党只是政客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加入政党不过是参与竞选时法律规定所必须的,政客的独立性和流动性非常高。当泰爱泰党被解散后,很多泰爱泰党的成员便加入人民力量党,并再次赢得大选。民盟发动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几位政客争权夺利的后果。其实民盟的许多成员当年就是他信的支持者,其核心领导人物的林明达更是他信的盟友,可当他们不能从他信政府得到好处后,就走上了反对他信政府的道路,根本谈不上对民主理念的坚持。而他信曾被认为是泰国新政治的希望,在其第一任任期内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在接下来的任期内的所作所为却让人不敢苟同。在经济上,他信不仅在出卖家族股份中有以权谋私之嫌,利用法律漏洞免交了3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利用外交活动为家族企业开疆拓土。在政治上,他信大规模地向个人集权。他不仅通过壮大泰爱泰党来减轻其他政党的压力,而且还通过重新组阁来控制内阁大臣,削弱其他政客对他信讨价还价的权力。此外,他信还严控媒体,插手军队,突击提拔了100多名中级军官。作为继任者的沙马,也以“他信的代理人”自居,在未能对动荡的政局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反而迅速迎接流亡国外的他信回国,并希望通过修宪来终止对他信涉嫌案件的调查,不仅恶化了政局,也使自己卷入了漩涡。当然,泰国的军方也并不是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在历史上他们就曾多次酿成流血事件。他们反对他信而发动政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信染指军方的权和利,他们在他信流亡之后对文人政府的纷争袖手旁观,更多的只是文人政府尚未威胁到军方的权益和地位。

3. 民众乱政

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应该是理性的,为理智而不是为感情所指导的,是为公共利益以及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狭隘的私人利益参与政治。而在泰国,不论是主要由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民盟支持者,还是主要由中下层民众参与的反独联示威者都相当迷恋街头政治,冲击政府机关,破坏日常的政务活动,甚至造成流血冲突。2008年8月26日,上万名民盟支持者冲击国家电视台和政府办公机构,占领总理府,与警方对峙,并要求民选政府下台。9月1日,民盟支持者与警方在曼谷爆发冲突,至少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9月2日,数千名政府支持者和反政府示威者在曼谷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1人死亡,43人受伤。10月7日,民盟支持者把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的颂猜困于国会大院内,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两人死亡,400多人受伤。11月24日,民盟支持者包围了泰国国会大院,迫使国会取消了当天的上下两院联席会议,25日,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集会,并控制了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飞行控制中心,26日,又占领了总理府和曼谷廊曼机场。11月30日,支持政府的反独裁民主联盟召集支持者在曼谷市政厅门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民盟占领总理府及曼谷两座机场。2009年3月26日,数万名反独联支持者再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示威活动,并包围了总理府。4月7日,反独联支持者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帕塔亚举行反政府集会,抗议在帕塔亚举行泰国内阁会议,总理阿披实在返回曼谷时遭反政府集会者围攻。4月10日和11日,反独联示威者在帕塔亚多次突破泰国警方在东盟系列峰会会场外围设立的警戒线,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严重干扰了东盟系列峰会的正常进行,迫使政府取消东盟系列峰会。4月13日,反独联支持者发动骚乱,造成2人死亡,123人受伤。可以说,不管是民盟支持者,还是反独联支持者都缺乏现代社会政治参与者应有的理性、宽容、妥协精神。

4. 金钱政治

在西方国家,金钱是政治的“乳母”,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法对选举中金钱的数量和使用方式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泰国,随着经济的起飞,金钱在泰国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保罗·汉德利认为,在炳政府之后的八九年泰国确实已经是金钱政治的时代了。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领导人

没有支持加强民主化和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相反,他们却利用了其财富和政治关系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金钱政治”时代。¹在农村地区,金钱的影响因素更大,贿选更有市场,候选人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明智地把金钱花到该花的地方。“无视国家法律,用金钱收买选票的做法,像流行病一样扩散到各个地方选举中。它就像大火烧过田野一样在全国蔓延……。国家的权力将落入到那些得到地方‘黑势力’支持的资本家手中。民主的舞台将被经济势力和特权阶层所控制。”²其实,他信的兴起就非常形象地意味着金钱和政治的结合,作为“电信大亨”、家族资本的代表,他信的上台无疑得到了像西那瓦财团、杰士民财团、盘谷银行、正大卜蜂等资本集团的支持。金钱与政治的深度结合无疑会加深泰国政治的固疾——政治庇护关系,助长腐败和权力的滥用,并进而损害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府的合法性,为政局动荡埋下祸根。

泰国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

1. 地区发展失衡、阶层过度分化

泰国有76个一级行政区划,可以划分为五大地区: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曼谷地区。2006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910亿泰株,城市化率为29.3%,全国人口有62828700人,其中94.6%的人信仰小乘佛教。”虽然泰国早已被世界银行评定为初级发达国家,但泰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阶层之间的差距也相当的大。

(1)泰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泰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但主要集中在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在泰国的东北部地区、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

¹ 乌吉·巴玛南. 泰国的全球化和民主发展:军队、私营部门和公众社会的新变化. 南洋资料译丛, 2004(2)

² 饶伟讯. 泰国的政治变化:民主和参与.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2002: 185

» 泰国2007年统计数据. <http://web.nso.go.th/eng/pul/keystal/key07/key07.zip>

带来的繁荣。2006年,泰国的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7 787泰株,曼谷地区为33 088泰株,而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分别只有11 815泰株和13 146泰株。在泰国月平均收入最高的10个府中,有9个分布在曼谷及其周边的中部地区,而在月平均收入最低的10个府中,10个都聚集在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在那些没有假日、没有节日、没有社会保障的低收入的、长时间的、艰辛的非正式工作中,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拥有这样工作的人在全国占了73.3%。¹泰国全国有9.6%的人属于贫困人口,在曼谷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为0.5%和3.3%,而在东北地区和北部地区这个比例则高达16.8%和12.0%。²2003年,在泰国北部、东北部的一些贫困地区,有的乡村民众年收入尚不足30美元。”

(2) 泰国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度拉大。在泰国6 300余万的人口中,其中约70%属于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以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为代表的中上阶层约占了人口的30%。中上阶层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但他们控制的财富在泰国的经济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2005年,在泰国农村地区,仍有近1 800万人日收入不足2美元,其中400多万人日收入甚至不足1美元。³2006年,泰国尚有3.6%的城市人口和12.0%的农村人口属于贫困人口。2007年,农民的名义收入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分别增加了5.5%和2.3%,而农村和城市的消费物价指数却分别上涨了4.1%和2.7%⁴,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远赶不上中上阶层。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社会,相对于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中上阶层可以广泛地利用电话网、手机网、互联网、电视网等工具,使得中上阶层能够高效率地进行动员并对政治权力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 政治制度不健全,法治缺失

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产生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分歧和相互作用,是解

¹ 泰国2007年统计数据. <http://web.nso.go.th/eng/pul/keystat/key07/key07.zip>

²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THAILAND/Resources/Economic-Monitor/2008April-tem.pdf>

³ 田禾,周方治. 泰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2

⁴ 同上书:222

⁵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THAILAND/Resources/Economic-Monitor/2008April-tem.pdf>

决各种社会势力间分歧的程序,也是组织手段逐步发展的结果。一个政治制度衰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必然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如果政治制度化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展而发展,则很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¹从泰国政治的现实来看,泰国军人干政、政客弄权、民众乱政、金钱政治等乱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泰国政治制度的不健全,法治缺失。

(1) 军事制度无法有效地规范军队与政府的关系。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原本是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暴力工具。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泰国始终未能形成“文人治军”的政治观念与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泰国军警部门一直都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对于人、财、物的调配都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并不完全服从于政府和国会的节制与调遣,失去有效制约的军方势力曾多次反过来控制国家政权并建立了独裁政府,并导致流血事件。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步伐较快,《1997年宪法》更是被誉为“民主的里程碑”。但是该体制并没有对军队的权力和利益进行合理的考虑,军队与政府的关系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军人集团虽然形式上已退出政治舞台,但文人政府却并未能对其进行有效地治理,依然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游离于民主体制之外。在泰国的政治现实中,军人集团的影响力不可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让其回归原本的位置需要对军人集团进行利益置换和时间的历练。像他信政府那样骤然地干涉军队内部事务和大幅度地削减国防预算,无疑激化了军队和政府的紧张关系,为军人集团的干政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当反对他信的力量在街头集结的时候,军人集团也再一次走上了泰国的政治前台。

(2) 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工具色彩严重。泰国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泰国政党是从拥有浓厚庇护文化、等级文化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土壤里诞生的,其诞生之后又一直受到以军人为首的政权的操纵,长期处在非法和畸形发展的状态,没有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在1932—1996年总共64年时间里,竟有38年中政党处于非法状态,政党在完全合法状态生

¹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 11-56

存的时间仅仅有 26 年。而由于政党法的制定落后于宪法,在 64 年的时间里,政党活动的真正合法时间只有大约 15 年时间,只占约 23%。¹ 由于政党长期处在非法和畸形发展的状态,就很容易沦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工具。在现代政治结构中,政权的合法性离不开政党,政权的权威也需要借助政党的力量。不仅军方有时候需要政党支撑其门面,而且政客也纷纷通过加入或退出政党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政党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操纵,就不可能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如果政党沦为某一社会力量的代言人,那么它就失去了本来的身份,只能成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泰国的政党从未代表真正的社会力量,只不过代表统治阶级上层的朋党和个人。”² 我们可以发现,在泰国政坛上不仅政党林立,缺乏根基,而且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庇护网,党内论资排辈和政治斗争现象严重,为了得到眼前利益可以随时修改党纲甚至退党、解党都在所不惜。

选举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伟大的创造,通过它,人们可以用选票来和平地改变政府,而不需要用暴力和革命来推翻政府。泰国的选举制度从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却一直命途多舛,时断时续。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政治文明得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选举制度依然被既得利益集团按自身需要而数次修改。为了改变小党林立的政治格局,《1997 年宪法》将众议院选举由原来的多名选区制,改为单名选区制,并增设比例代表制,而且还规定“全国选区得票不足 5% 的政党不得参与议席分配”。出乎意料的是,面对泰爱泰党作为大型政党的崛起,在 2006 年军事政变之后,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反他信”派为了遏制大型政党的扩张,在《2007 年宪法》中针对泰爱泰党修改了有关众议院选举的条文。选举制度如此量体裁衣,当然可以有效地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不过这也极大地损害了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3) 法治缺失。泰国的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但是议会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相当长的时间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充当政府道具的作用。从 1932

¹ 任一雄. 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 泰国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1-62

²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398-401

年至 1999 年共 67 年的时间里, 泰国一共颁布了 16 部宪法(包括临时宪法及其修改稿), 共产生了 29 届议会, 这些议会都是在发少政变, 宪法被废除之后产生的, 议会处在一种无法正常行使职权的状态之中, 此时的议会, 完全听命于政府, 或者只是一钟摆设,¹ 其立法质量和法律的权威可想而知。相对于宪政国家而言, 泰国的宪法修改相当随意, 更多的只是服务于执政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不仅没有遵循正当的程序, 也没有正当的内容, 徒具民主的外衣, 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内心认同。民主须以法治为基础, 没有法治, 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民主。而宪法没有尊言, 就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精神熏陶的民众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就很可能破坏民主的游戏规则。在此次泰国政府的危机中, 尽管民盟的成员主要是由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组成, 但其依然迷恋街头政治, 组织民众冲击政府机关, 包围总理府, 甚至造成流血冲突, 试图通过这些非民主的手段来颠覆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对于泰国刑事法庭批准逮捕的民盟领导人, 许多明盟成员也予以抵制。一个素质相对较高的阶层都如此缺乏民主的素养、蔑视法治, 又有什么理由来奢望广大下层民众有更好的表现呢?

3. 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

在泰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庇护文化、等级制不仅仅是观念问题, 也是日常行为的规范, 甚至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方式”, 给泰国的民主政治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1) 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等级制、家长制的不良影响。在泰国的封建时代, 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 王室、贵族、平民、奴隶依次排序的权力差序格局, 权力由内向外辐射, 国王享有特殊的权威。直到目前, 这种扎根于自然经济的封建等级制在泰国特别是广大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在泰国, 见面时小辈、地位低者一定要先向长者或地位高者行礼且双手应至鼻或更高, 而还礼者则只需在下颌处或更低合十即可。相互间的称呼更是要讲究长幼辈分、地位等的区别, 较熟悉者之间下对上一习惯以亲戚关系称呼, 对位尊者则要用敬词来称呼。² 与儒家传统类似, 家长制的统治模式也是泰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

¹ 任一雄. 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 泰国个案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8

² 任一雄. 传统文化的张力与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 国际政治研究, 2003(2)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中,父权至今仍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2)以依附制为代表的庇护文化的不良影响。在古代泰国,社会下层“小人”通常向社会上层“大人”朝贡以得到偏袒和保护,从而确立依附关系。当“小人”给“大人”朝贡或为其服劳役时,“大人”应给予一定的保护和帮助,“小人”才会继续这样做,否则他们就会停止朝贡和服役。¹这种依附文化的核心是上层对下层的庇护和下层对上层的忠诚。在今天,这种庇护文化在泰国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每次大选中,上层的政治人物要想获得选举的胜利,必需给予地方实力派权和利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而这些地方实力派其实就是泰国传统意义上的庇护者,他们可以利用从上层获得的权和利向下层民众施恩,并凭借自己是庇护者的角色,通过各种依附关系把地方选民手中的选票汇集到自己手中,民众通过选票的汇集表达了他们的忠诚,从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依附制。

泰国政局动荡的重要启示

作为一个初步发展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的情况与泰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如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拉大、法治建设有待加强、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等,而这些问题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泰国政局动荡的原因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及时解决地区发展失衡、阶层过度分化问题,以缓和地区分化和阶层分化矛盾

泰国的实践表明,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导致地区对地区、阶层对阶层的不满,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当前,我国也存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阶层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据统计,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 200元,西部地区为8 970元。2006

¹ 赵永胜. 古代泰国政治中的亲属关系和依附制度. 东南亚, 1999(1)

年,西部 12 个省市自治区 GDP 总和不到人民币 4 万亿元,约占全国 GDP 的 17%;而东部地区 GDP 达到 2 万亿元的省份就有 3 个,其中江苏省为 21 500 亿元,山东省为 22 000 亿元,广东省为 25 000 亿元。目前,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是西部地区的 1.5 倍。东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 5%,仅为东部的 1/10。¹ 在过去的 17 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 12 倍。2007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 3.33:1,绝对差距达到 9 646 元。² 2006 年,城镇居民中 20% 最高收入组(25 410.8 元)是 20% 最低收入组(4 567.1 元)的 5.6 倍;农村居民中 20% 最高收入组(8 474.8 元)是 20% 最低收入组(1 182.5 元)的 7.2 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 0.16 上升到目前的 0.4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从泰国的教训看,我们建设民主政治,首先必须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及时解决地区发展失衡、阶层过度分化问题,以缓和地区分化和阶层分化矛盾。

2. 必须坚决树立宪法至上权威,建设法治社会

宪法至上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征,法律是否享有权威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一个基本尺度。“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如果人民普遍具有够水准的宪法素养,知道如何建立稳定的宪政秩序,愿意为维护宪法而打拼,则国家必然和平繁荣,人民必然自由安乐。反之,如果人民的宪法素养低落,欠缺正确的宪法意识,甚至视宪法如无物,则宪政难以上轨道,国家岂能安定? 人民岂能幸福?”³ 泰国的情况正是这句名言的生动写照。在泰国,由于宪法得不到尊重,许多民众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往往触碰法治的底线,破

¹ 李云平,张丽娜. 我国东部人均 GDP 为西部 2.2 倍.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4/content_6529802.htm

² 蔡 主编.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³ 李欣欣.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1/content_7640629.htm

⁴ 许志雄. 宪法与宪法学. 台、港、澳及海外法学(人大复印资料),1999(10)

坏民主的游戏规则,从而导致矛盾的恶化、社会的撕裂和政府的动荡。在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形成法治信仰。只有当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实现法治化生活方式时,法治社会才会真正到来。卢梭曾经指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¹当然,光有法治的信仰还不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行,宪法权威的树立必须靠宪法切实彻底地实施,让民众感觉到宪法就在人们的身边,给个人的权利以最高、最彻底的保障。然而,在我国,宪法的权威尚未确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还广泛存在,人民的权利还未得到切实保障,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

3. 必须深化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规范完善利益表达渠道

“政治制度是基于一定规则和程序之上规范个人和团体行为的长期稳定的安排,它体现为各种明确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则和决策程序,具有正式和合法的特点,通常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²虽然泰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但其政治制度仍然存在诸多缺陷,比如:政治僵局无法依靠常规手段打破,政治制度的容纳性和适应性比较差,缺乏有效地利益表达机制等。其实,泰国政治频发军人干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泰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我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必须深化制度建设,规制利益表达。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过于强势,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陷入这个阶层或利益集团专横跋扈的统治之下。当所有阶层、集团都被动员起来参政之后,就不会有哪个阶层或集团有过度参政的机会,任何一个单独的阶层或集团都将面临强大的制约。当前,我国某些阶层和群体就相当的强势,其利益表达的途径、能力远非一般的阶层和群体所能比拟,他们甚至能绑架相关部委的决策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广大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则缺乏相关的渠道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当然,制度的缺陷必须通过

¹ 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1: 73

² Heywood A.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N. Y. St. Martin's Press, 2000: 93

深化制度建设来解决,而不是压制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仅要把农民、城市弱势群体、中产阶级等各个群体纳入制度内的参政渠道,而且还要规制各个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4. 必须肃清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影响,切实加强公民教育,培养成熟公民政治文化

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¹ 在泰国,我们就可以鲜明的发现“传统的人”与“先进的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落差而产生的困境: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盟和广大中下层民众参与的反独联之间的互不妥协、反政府力量与民选政府之间的互不妥协,从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安。反政府力量甚至鼓动支持者冲击国家机构,造成流血事件,给泰国的政局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建设民主政治,必须加强公民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文化,不断增强公民负责、理性、宽容、妥协的精神。作为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特别是公民中的精英,不能过分地伸张自己的利益,而对广大下层民众状况和其它利益受损阶层视而不见。在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中,大多数的少数派的经验显示,诉诸暴力是愚蠢的策略。如果保护民主进程,并把批判的精力引入这一进程做政治上的对抗,就能更肯定地找到补救的办法,而且是持久的补救办法²。当然,严重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有可能撕裂,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中的精英必须带头达成妥协,最起码必须为政治生活定下和解与宽容的基调。他们必须表明他们信任民主程序和恪守那些超越对权力或其他利益的追求的规则。不管民主的结果是什么,从长远来看,该结果比导致民主政治崩溃、危险的不妥协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责任编辑:张业亮)

¹ 英格尔斯. 走向现代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435

² 科恩. 论民主. 商务印书馆, 1988: 229